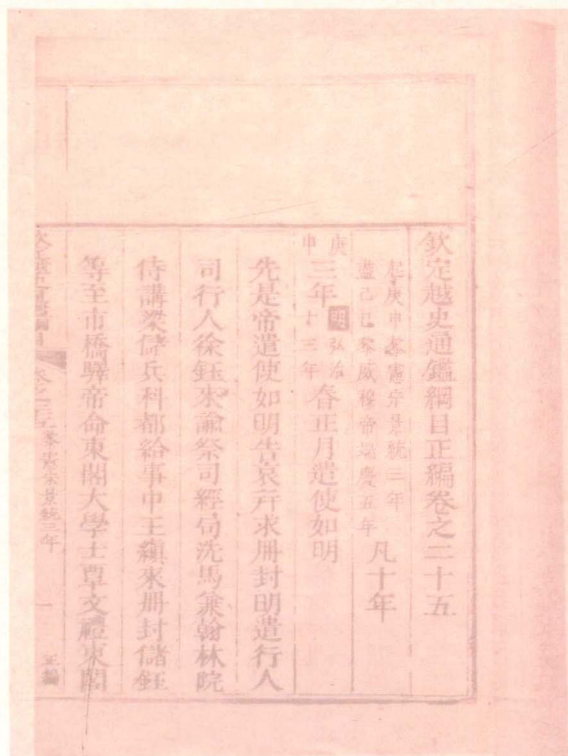




上海出版基金項目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陈正宏 著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陈正宏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陈正宏著. —上海:中西书局,
2014.10

ISBN 978-7-5475-0729-2

I. ①东… II. ①陈… III. ①汉语—古籍—版本—研
究—东亚 IV. ①G25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5483号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陈正宏 著

责任编辑 田 颖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729-2/G·203

定 价 128.00元

序

[韩] 金文京

中国、越南、朝鲜(韩国)、日本(包括琉球)这几个国家,自古以来直至现代共用汉字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因此,素被称为汉字文化圈。而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文化交流乃以汉字书籍即汉籍的传递与流通为主要媒介。与此相比,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相对薄弱。

早在唐代,朝鲜半岛的新罗所派使者或日本的遣唐使都异常热心收购中国典籍,以致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旧唐书·张鹭传》云:“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张鹭所著小说《游仙窟》就是这样传到日本,广为流行的。又如日本古代佛教名僧弘法大师空海与传教大师最澄,都于804年分别以留学僧、请益僧的身份赴唐。可是他们在唐土停留的时间都很短,空海是两年,最澄则仅仅十个月。而据空海《御请来目录》、最澄《传教大师将来目录》及相关资料,两人都从唐朝带回大量的佛经、佛像、佛具以及若干外典书。最澄则因不谙华言,身边带了翻译僧义真一起去唐。显然,他们去中国的目的不是从师深造,而是为了收集书籍,回国后慢慢阅读。再者,新罗最有名的

僧人元晓大师曾经两度试图入唐，第一次走旱路因中间受阻不果，第二次则取海路却中途忽然改了主意便折回来了。而他的著作后来传到中国和日本，引起了不小影响。

古代航海术未甚发达，要飘海渡洋难免有极大的风险。唐代的交往以官方为主，民间交流尚不成气候，大概是这个原因。可是，后来由于技术的改良进步，风险渐为减少，至宋元时代，海上交通已臻相当安全的程度了。因此，此时日本和中国的正式邦交虽为隔断，民间的交流却蒸蒸日上，无论规模或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唐代。尤其禅宗僧人跨越海域的活动，大大增进了彼此的学术交流和书籍的往来。

到了明清时期，海上交通的条件更加完善，连远海航路也都几乎保险无虞了。按理，航海术的发达促进彼此的人际交流才是。可是，事实恰如其反，因由诸如明朝的海禁、日本的锁国以及朝鲜王朝同样的政策，民间互相来往极度受限，大不如宋元时期。官方交流似也没有唐代的自由了。而此时的汉籍交流却仍然有增无减。如每年朝鲜官方派往北京的使节，虽然行动自由有限，却千方百计收购书籍带回本国；日本则通过唯一的开放港口长崎不断地输入了汉籍。结果，朝日两国都至收藏大量的汉籍，同时自己也出版了其中不少书。只是朝鲜半岛历来战事频仍，本来丰富的藏书不幸流失过半。日本作为岛国，从无受过外族侵略，能维持比较稳定的社会。因此，他们的收藏除中国典籍之外，也包含着从朝鲜流入或掠夺的书籍，尤为可观，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已经遗失的书。

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特别关注这些中土已佚却藏在日本的汉籍，就称为佚存书。所谓佚存即彼（中国）佚此（日本）存之意。他们热心把日藏佚存书介绍到中土，18世纪末期的学者林述斋所刊《佚存丛书》具有象征意义。而当时中土学者看到这些书，自也无不惊叹。可是，我们如果细心斟酌日人所以有此举背后的心态，不难看出有意向中国夸示日本文化优势的骄傲。一句话，是为了宣扬国威。而中国人则惊叹归惊叹，面临这种情况时他们的一般反应就是一句孔子的名言，

即“礼失而求诸野”了。也就是说，虽然中土已然遗失，留在野蛮的域外，书还是自己的。佚存书的回归，自来被赞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是，我们似应同时关注此一“佳话”所隐含的两国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应一味粉饰太平。总之，发生这样矛盾的原因，恐怕也可以归咎于只有书籍交流，欠缺人际来往的历史失落吧。

直至19世纪后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迎来了新的局面。国禁一开，来往之路通矣。自此往后，很多中土人士纷纷来到日本，更加热心寻找佚存书。其中编刊《古逸丛书》的黎庶昌和杨守敬可视为代表人物。黎、杨两氏通过笔谈与日本学者有所来往，尽管如此，他们的话题多半没离开过书籍，谈不上广义的文化交流。到了20世纪，东亚国际关系再度陷入了低沉。其前半期虽然人际交流依然，却因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乃至殖民地统治，彼此的关系就有不平等、不正常的偏颇，带来了严重的后患；二战结束后的后半期则于世界情势冷战体制之下，中越韩日各国交流无论官方或民间普遍低落，仅能形容为不绝如缕了。

这种情况，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是由于中国、越南等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才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时至如今人际交流呈现了空前的自由且热络。随着此一新潮流，一批新世代的中国学者开始访问韩日越各国，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他们跟以往学者所不同的是，第一，观念上摆脱了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主观意识，能够以更广泛客观的视野来观察东亚全局；第二，不仅对所谓的佚存书，对和刻本、日本写本、朝鲜本、越南本等各国独自刊写的书籍以及其背后的各国历史、社会情况也积极关注，能够进行平心的比较；第三，精通各国语言和文化，能够站在平等的立场，与各国学者沟通、讨论。而目前据我所知，其中最具代表性，且成绩斐然的学者，就是此书的作者陈正宏先生。

这十多年来，陈先生屡次访问日本各地包括冲绳（即琉球）以及韩国，在当地主要的图书馆进行认真的探查，逛遍了各地的古书店，收集了不少资料，也经常跟日韩学者合作、交换意见。近年来，他又去了越南和法国，对越南汉籍做了

同样的调查。有关东亚汉籍研究视野之广阔、经验之丰富、鉴定之精审，当今学界恐怕无出其右者。也因此，要提倡东亚汉籍版本学，相信陈先生应该是最佳人选。

此书的内容自是陈先生这十多年来孜孜矻矻辛勤努力的成果，也算是现阶段的总结。其中诸如宋本书根字纵题的讨论，除细心观察各地硕果仅存的资料之外，还参照了越南的例子，打破以往狭窄的看法，足见视力之精确且辽阔；有关《豫恕堂丛书》的研究，阐明了过去不甚明了的制造版本具体工程以及刻书工人酬金等相关问题，增加了新知；单刻本与全集的比较，以袁枚为例，把版本学与文学研究挂钩，足以发人深思；探讨朝鲜印本字体衍变问题，则深入到字体里所隐含的政治导向，衬托出朝鲜对清朝由蔑视到认同的观感变化，可谓眼光透彻纸背；至于乾隆时期朝鲜燕贸活字以及《生生字谱》的问题，通过史料的细心阅读，提出了武英殿聚珍版本活字流入朝鲜的大胆假设；其中尤为精彩的，应该是有关套印本的讨论。陈先生不仅把中国、日本、越南的现存套印本详加比较，指出其间的同异，勾勒演变过程，进一步利用他在日本京都偶得的《芥舟学画编》的套印书版实物，追求套印印刷术的具体操作，兼及朝鲜没有出现套印本的原因，堪称东亚版本学研究全面展开的最成功的例子。这些无一不是道出前人之未能言，考出先人之未所悟，足见功底已深。

至于理论框架问题，陈先生在讨论琉球本与福建本的关系时，就提出把东亚汉籍版本分为“第一类：原发性的中国本；第二类：综合继承中国本而又有各自创造的日本本、朝鲜本；第三类：主要受中国或中日两国特定区域版本影响而来的越南本、琉球本”的三个分层次类型。其中第三类型乃跨越国境局限，引入了“小交流圈”的新概念。这样的框架，既为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又能切近实际，我个人认为颇有见地，应该是往后研究的指标。

我和陈先生已有多年的交流。陈先生是已故章培恒教授的高足，而章教授曾于1979年做为中日复交后头一位中国大陆派到日本的学者，在神户大学讲学

时,我有幸旁听一年。所以我们俩也不妨说有同门之谊。1989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拜谒章教授时,由章教授的引介,我们就认识订交了。之后荏苒二十五年的岁月中,时而 在京都、东京、仙台,时而 在上海、北京、首尔,我们见过好多次,每次交谈都特别投机,感到愉快,也受益匪浅。因此,我虽比陈先生大十岁,自不敢居兄,可谓忘年之交。当年青衿学子现已蔚然成为斯学大家,而志学热诚依然如故,而今拜读了他这本新书,心中欣慰之余,回首前尘,不无感慨。

我不是研究版本学的,写此书的序,自知本来不甚合适。之所以答应陈先生的要求,除了要借此聊为报答长年友谊之外,其实,别有一种考量。我在前面论述的东亚交流史,简单地说,书籍交流自古迄今一直持续不变,且有随时增加的趋势,而民间人际来往则有盛有衰。其第一个高峰应该是宋元时期,第二就是晚清民初,我们所处的当代大概是第三个回合了。而这三个时段乃由交通工具的渐备、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等种种原因,每况愈胜,当代交流的规模及自由度远比前两次时段扩大了。这就是目前东亚各方面的频繁交流恃以发展的客观条件。可是,我们也不禁自问,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会不会如同前两次一般,由于政治、军事情势的剧变,有朝一日戛然告终?乃不无隐忧,前途难卜。

这本书所谈的版本学是一门专业性极高的领域,似与世事无关。可是陈先生既然高举了东亚版本学的旗帜,要建立把东亚各国平等对待的崭新研究模式,其底蕴所内涵的理念,应与当今时代关怀息息相连。说实在,过去以书籍为主,失落人际的交往,不得不说是个反常的关系。我们应该把它颠倒过来,在稳定持续的人际交流的基础上,再发展书籍、文化的交流。陈先生做这方面的研究,须要跨越国度,穿梭东西,都有赖于自由和平的交流关系。因此,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赞同我的看法。愿与陈先生以及此书广大的读者,以此共勉。谨为序。

2014年8月于日本京都

目 录

001 — 序 / [韩]金文京

001 — 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

——以印本为中心

013 — 东亚汉籍印本鉴定概说

035 — 雕版研究在东亚汉籍版本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所见中日汉籍书版的比较为中心

045 — 宋本书根字纵题杂考

061 — 从写样到红印

——《豫恕堂丛书》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

085 — 从单刻到全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

——《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

107 — 东亚出版文化中越南本汉籍的意义

——以两种日本藏越南本为例

125 — 越南汉籍里的中国代刻本

143 — 朝鲜本与明清内府本

——以印本的字体和色彩为中心

163 — 琉球本与福建本

——以《二十四孝》、《童子摭谈》为例

179 — 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朝鲜铜活字本《史记》初探

193 — 中国早期金属活字印本散考

——以三种明弘治间无锡华氏会通馆印本为中心

217 — 乾隆庚戌辛亥朝鲜燕贸活字考

——兼探朝鲜著名活字“生生字”及《生生字谱》之来源

235 — 红与黑：汉籍套印本里的穿插之美

247 — 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

263 — 套印与评点关系之再检讨

——以几种东亚汉籍双色印评点本为例

273 — 附录：琉球故地访书记

285 — 论文初出、外译及增订情况一览

288 — 跋

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

——以印本为中心

中国的古籍版本学，向以本国古籍的历代版本（尤其是历代印本）为研究对象，对于古代中国周边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琉球、日本等国家以汉文（主要是汉语文言文）写刊的域外汉籍的版本，自来较少关注。而将中国古籍版本与域外汉籍版本联系起来，加以系统完整的考察，则迄今尚未见相关论著发表。本文因此提出“东亚汉籍版本学”这一概念，并就相关问题贡献若干不成熟的想法，恳请有关专家学者教正。

一、汉籍、域外汉籍、东亚汉籍及东亚汉籍版本学

从古籍版本学的中国背景而言，“古籍”一词无需解说，必然是指中国古籍，这样的看法似无不妥。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出发，基于文本的共性，对作为一个历史有机体的古籍版本，作通盘的考虑，则古代世界中以汉文（主要是汉语文言文）撰写、刊行的书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籍”，实有必要作为一个值得重视的版本学概念加以特别的关注。

按照写印地域的不同,汉籍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古籍中以汉文写印的书籍,另一部分是古代中国之外的国家或地区以汉文写印的书籍。前者可以名为中国汉籍,以与中国古籍中的少数民族古籍相区别;后者则已有一个通行的称呼——域外汉籍。^①

由于域外汉籍的主体,是古代中国周边受汉文化深刻影响的几个国家或地区(主要是朝鲜半岛、越南、琉球、日本)以汉文撰写、刊行的书籍,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大都位于今天的广义上的东亚地区(含东北亚和东南亚),而中国本身又是东亚第一大国,所以从研究课题的集中有效考虑,我们提出“东亚汉籍”这一概念,以指称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受汉文化深刻影响的朝鲜半岛、越南、琉球、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以汉文写刊的书籍;相应地,研究东亚汉籍版本的专门学问,也就是“东亚汉籍版本学”了。

从更细致的地域区分角度看,东亚汉籍又可以分为中国本、朝鲜本(又称高丽本)、越南本(又称安南本)、琉球本、日本本(又称和刻本)等多种。其形式,则各自又都可以分为印本和写本两类,本文以印本为讨论的中心。^②

二、从汉籍刊印的历史与文本共性看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成立依据

东亚是印刷术的故乡。历史上东亚汉籍的刊印过程,基本上是沿着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和地区始于模仿中国,其后又渐次各有创造与超越,这样一条路径发展的。其间所呈现的东亚汉籍刊印的历史共性与文本共性,主要有以下三个

① 张伯伟等先生认为“域外汉籍”当是指域外收藏的汉籍,故应包括目前为域外机构或个人收藏的中国古籍。本文则从版本学的角度出发,将“域外汉籍”界定为域外机构或个人以汉文写印的古籍,而不把域外机构或个人收藏的中国古籍包括在“域外汉籍”中。

② 关于朝鲜本、越南本、日本本等术语,本书所收拙作《东亚汉籍印本鉴定概说》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说明,可参阅。

方面。三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了建立东亚汉籍版本学的基本依据。^①

第一,从汉籍刊印的内容看,中、朝、越、日四国都是由刊印汉文佛经发轫,而后渐次转向内、外典兼备。^②而无论是汉文佛经还是教外四部典籍,早期的域外汉籍印本基本上都是以中国本为基础翻刻或覆刻的。

研究表明,文献记载最早的印刷品出现在7世纪的中国。而现已发现的可大致判定刊印时代的印刷实物,则均出自8世纪的东亚诸国,且无一例外均是汉文佛经。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从韩国庆州佛国寺的释迦塔内发现、韩国学界认为刻印时间不晚于8世纪中叶的著名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时代刊刻的一批《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俗称“百万塔陀罗尼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重要的印刷文物,与中国国内迄今考古发现的同时期印刷品相比,从形式到内容均颇多相似。而越南的自行刊印书籍,虽然要晚至13世纪末叶的天长府“副本刊行”中国元代《大藏经》,但始刊的同样也是汉文佛经。此外,东亚诸国刊印佛经之外的四部典籍的年代及其先后顺次,也颇值得关注。据现有资料,中国至晚在10世纪前期就已刊印儒家经典。之后朝鲜半岛从11世纪开始,出现“官版”系统的印本,其特点是应科举之需,大量翻刻中国经史书籍。随后到13世纪中后期,日本也从单刻佛经转向兼印外典,出现了以中国流入日本的宋元刊本为底本翻刻的“五山版”汉籍。最后到15世纪中叶,越南也开始大规模地刊印佛经以外的四部书籍。东亚汉籍刊印初始阶段的这一内容上的共性,使得任何孤立于一隅的汉籍版本研究都不可能获得完满的结果,而唯有突破狭隘的

① 以下有关东亚汉籍刊刻史实的叙述,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源自下列论著的相关部分: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2.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日)长泽规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歴史》,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2卷,汲古书院,1982年;4.(日)川瀬一马《書誌学入門》,雄松堂,2001年;5.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韩)千惠凤《韩国古印刷史》,韩国图书馆学研究会,1976年;7.(越)明峥:《越南史略》,三联书店,1958年;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② 琉球印本现存数量甚少,刊印年代均较晚,琉球刊印汉籍的历史详情尚待研究,故本文以下的讨论暂不涉及。

国界束缚,展开更为广阔的多国文献互证与各国汉籍版本比勘,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这也成为我们提出建立东亚汉籍版本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二,由汉籍刊印的技术论,中、朝、越、日四国都是先有刻本,再发明活字本。而无论是刻本还是活字本,其制版或雕造活字的方法,以及刷印的工具与程序,均颇为相似;而细考历史,其间又颇有技术的交流,以此形成汉籍文本的版本特色,即出现了不少的异地刻印本、代刻本和特殊的活字印本。

按所谓异地刻印,是指刊刻书版与刷印书籍并非在同一国家地区内进行。这方面最早的例子,见于文献的,有北宋时福建商人徐戡将杭州所刻《夹注华严经》书版,通过海路运往朝鲜半岛以获利的例子。^①而相应地已经引起研究者较多关注的,则是19世纪后期中国广东佛山成为代刊越南本的主要地区的史实。^②最近的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时期,在上海也出现了将和刻本汉籍医书的书版运抵后,剽除其中的假名训读符号,以中国纸刷印出售给中国读者的情形。^③(图1-1)

至于活字印书,虽是中国北宋时代毕升发明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刷技术,但朝鲜半岛后来居上,自13世纪末后即以活字本为书籍的重要形式,其官铸铜活字印本更以书品精美著称,成为东亚汉籍在世界书籍刊印史上技术领先的一个重要例证。与朝鲜半岛广泛使用活字印书相关联的,还有16、17世纪之际日本江户时代出现的后阳成天皇和后水尾天皇分别敕刊的“庆长敕版”、“元和敕版”,与德川幕府首脑德川家康命人主持刊印的“伏见版”、“骏河版”,四者均用活字印刷,其中的部分活字,则是战争中获取的朝鲜活字。

技术程序上的这种步调一致,以及技术本身的交流情势,提醒我们在东亚

① 见苏轼《论高丽第一状》,收入《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本)卷三十四。

② 参见陈庆浩《越南汉喃籍之出版与目录》,收入矶部彰编《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こはく》,株式会社知泉书馆,2004年,第335页。另参本书所收拙作《越南汉籍里的中国代刻本》。

③ 此点承日本庆应大学高桥智教授见告。

又利止後更發熱

亦間有之。蓋其邪雖不一，唯飲食傷則均所不免云。
○伊澤信恬曰：易說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春
秋考異郵：襄公朝，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溼，
多霍亂之病。此霍亂之名，見古書。其證：內而清濁
亂之病，相隨屬也。此霍亂之名，見古書。其證：內而清濁
書者，亦可以資霍亂所因之攷證焉。
相干。心腹攪刺，上吐下瀉。靈樞經：脈篇，足太陰之別，
則霍亂。又五亂篇：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
氣逆行，清濁相干，云云。亂於腸胃，則為霍亂。王肯堂
曰：巢氏乃因此一條。○霍亂必外而邪正相搏，發熱
有腹痛，經不言者，蓋省文也。外而邪正相搏，發熱
頭痛，身疼惡寒。尤氏注：又利止復更發熱，曰：利止
裏和，則邪氣復還之表，而為發熱。今施治之法，以裏
人吐利之後，往往發熱煩渴者是也。施治之法，以裏
為急，即先溫其裏之例也。其病輕者，有熱多寒多之

傷寒論卷之五

霍亂篇第三

亦間有之。蓋其邪雖不一，唯飲食傷則均所不免云。
○伊澤信恬曰：易說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春
秋考異郵：襄公朝，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泥雨暑溼，
多霍亂之病。此霍亂之名，見古書。其證：內而清濁
亂之病，相隨屬也。此霍亂之名，見古書。其證：內而清濁
書者，亦可以資霍亂所因之攷證焉。
相干。心腹攪刺，上吐下瀉。靈樞經：脈篇，足太陰之別，
則霍亂。又五亂篇：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
氣逆行，清濁相干，云云。亂於腸胃，則為霍亂。王肯堂
曰：巢氏乃因此一條。○霍亂必外而邪正相搏，發熱
有腹痛，經不言者，蓋省文也。外而邪正相搏，發熱
頭痛，身疼惡寒。尤氏注：又利止復更發熱，曰：利止
裏和，則邪氣復還之表，而為發熱。今施治之法，以裏
人吐利之後，往往發熱煩渴者是也。施治之法，以裏
為急，即先溫其裏之例也。其病輕者，有熱多寒多之

图1-1 右为日本原刻原印本，左为被剝去字行间训读符号的中国后印本

汉籍版本（尤其是印本汉籍的版本）研究中采取通观的路径，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而东亚汉籍版本学，因此从逻辑上说也确实可以作为古典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成立。

第三，从汉籍刊印的成品看，中、朝、越、日四国几乎都经历了由卷子（或经折）到方册的演化，而最后也是最通行的装帧形式，则都选择了线装。^①与此相应，东亚汉籍线装本的基本版式与阅读方式，也一致是两个半叶组成一个对折的整叶，文序自上而下、行列自右向左的竖排右翻格式。

这样的书籍形式，自然不同于现代书籍的一页双面印刷，文序自左向右、行列自上而下的横排左翻格式，也不同于中国古籍中的某些少数民族古籍样式——最典型的，是清代的满文古籍，虽然也是线装本，也是两个半叶组成一个对折的整叶，文序也同样是自上而下竖排，但其行列却与东亚汉籍相反，不是自右向左，而是自左向右，以此满文古籍的翻阅程序，也非向右翻，而是向左翻。（图1-2）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中存在这类特殊的样式，使得同样是中国古籍，汉籍与少数民族古籍的版本形式差异，在某些情形下要大于中国汉籍与域外汉籍的版本形式差异，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古籍版本学现象，也是我们提出将东亚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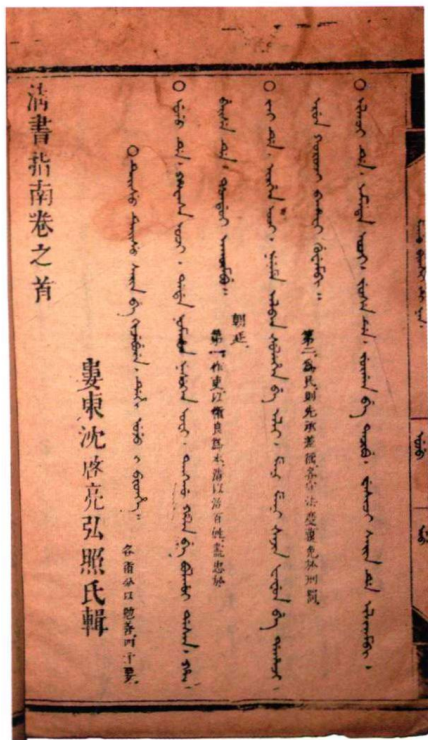


图1-2 中国清代满文古籍

① 当然在线装的具体形式上，各国略有差异，参见拙作《东亚汉籍印本鉴定概说》。

籍版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进而建立东亚汉籍版本学的理据之一。

三、东亚汉籍版本学的基本课题与研究方法

作为传统古典文献学的一个新起的分支,东亚汉籍版本学目前亟待展开的基本课题,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厘定东亚汉籍版本的基本术语,使各国各行其是的版本词汇,在互相比较的前提下,求同存异,逐渐归于合理的统一。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描述汉籍版本的等次、形制等,虽同样是使用汉字,但术语却五花八门,颇不相同。如同样是汉籍中文物价值较高的版本,在中国称“善本”,在韩国称“希贵本”、“贵重本”,在日本称“贵重书”;指称雕版印刷本的“刻本”一词,在中国十分常见,在韩国和日本却很少使用,相对应的术语是“木版本”(韩国)与“刊本”、“版本”、“摺本”(日本)等。又如一部书外封里面那叶通常印有书名、出版者与出版时间的扉叶,在中国叫“内封”或“书名叶”,在韩国叫“标题纸”,在日本则叫“見返”;书版一叶内间隔字行的竖线,在中国一般叫作“栏”或“栏线”(如“乌丝栏”、“朱丝栏”),在韩国多称为“行线”,在日本则通谓之“界”或“界线”。此外还有中日学者通称的“匡郭”,在韩国学者习惯叫“版廓”;中国本、朝鲜本里最常见的“线装”,日本书志学术语则谓之“袋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要使东亚汉籍版本学成为一门真正兼顾东亚各国汉籍的学问,则如何沟通、厘定歧异纷出的版本术语,并使之逐步趋向统一,显然是应当重点研究的课题。

二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东亚汉籍作系统的版本调查,在尽可能目验与比对的基础上,选定一批典型版本,作为学术研究的基准本。目前收藏在东亚各国的汉籍,有一部分的基本信息已通过版本图录或前辈学者的研究论著公之于世,其中不乏因此成为著名版本者。但是各家影印、著录时既无统一的目标,相互关联或相似的版本又多未经参互比对,从进行通观式的东亚汉籍版本学研究的角度